

元代漢軍藁城董氏本末

——元代漢軍三世家考之三——

孫克寬

一、前言

蒙古人用兵，善於用降，開始威之以屠殺，使之不得不降；降後即坦然信任，爵祿、土地、恣其所欲，而且子孫世襲職位，幾乎與國同休（註一）。因此構成了元代漢軍制度與一個特殊的軍事集團，在漠北四朝時期^{太祖至憲宗}大河南北，全是這些漢軍戍守（註二）。少數蒙古鐵騎僅僅往來策應，使南金不能渡河北爭尺寸，南宋一度北伐，也終於無成，不可不謂是漢軍的功績。

在這些漢軍中，河朔以史氏、張氏、董氏為最著。山東則推東平嚴氏，與濟南張氏；但嚴氏與汗庭關係較疏，早期撤藩，一傳之後，便沒沒無聞（註三）。張氏依人成事，早請歸朝，部族後裔以科名進身，不再是漢軍的面目（註四）。只有史、張、董三家，既親信，又有威重，子孫功名顯赫，直到元末才漸衰歇，實在是漢軍的中心人物，與各方關係也較複雜。我發願作元代漢軍三世家考，已寫過永清史氏本末，刊布於大陸雜誌，張柔行實考，刊於東海學報，現再將藁城董氏本末，撰為此文，以足成全篇。

董氏與史張兩家情形略有不同，史張二氏第一代即以戰功顯，開府一方面致身顯貴，開展許多事業（註五）。董氏第一代却是偏裨的身分，歿身行陣，幾乎助名沈沒。到了第二三代才以侍從宮廷的關係，以謹慎忠勤得到大汗的寵暱，成為宿衛親軍；又薰陶於儒學很深，為南北儒生所歸嚮，對漢文化的傳衍方面，貢獻了更大的力量。所以紀述董氏的事蹟，第二三代纔是重要的階段。

元代漢軍，儒學與道教三者同為漢文化傳流的重要支柱（註六）。史張二氏，對北方道教與儒學曾予維護汲引，使中原文化，得以維持不墜，為至元儒治的前奏；董氏却進一步汲引南方的儒學，弼成延祐——至順之間的後期儒治，幫助不少的南方儒士，過渡到後來為入明的南方儒學打下基礎，其影響尚在史張兩家之上。所以撰寫董氏本末，這一點是重要的一環。柯氏新元史董氏傳論說：

「藁城董氏與永清史氏，定與張氏皆為功臣之胄。董氏被服儒術，家法尤嚴，父子兄弟世濟其美，出任干城，入為腹心。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董氏之謂與！？」這就是我對董氏事業過程的看法。

（註一）參閱拙作「蒙古初期軍略及金之崩潰」蒙古之用俘節（此篇原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現交臺北中華書局收入漢文化之活動書中。即將出版。）

(註二) 參閱拙著「元代漢軍人物表」(大陸雜誌慶祝朱家驊七十二歲專刊)。

(註三) 關於嚴實事蹟見拙著東平興學考(元初儒學, 現收元代初漢文化之活動內), 嚴實之子忠範嗣爵, 於至元初撤藩入朝, 後於南伐時奉使臨安死於獨松關, 見元史, 新元史嚴實傳。

(註四) 張榮事見元史本傳, 其孫宏事見元文類卷五十。張起巖撰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起巖延祐開科進士第一人, 及元中葉名臣張養浩, 皆濟南人, 張氏部族之裔。

(註五) 史天倪爲眞定元帥, 死於武仙之叛, 史天澤世祖中統間入相, 保全功名。張柔爲伐宋萬戶, 結納元好問, 保存金寶錄。其子宏範襲其餘業, 統帥南征之軍, 滅宋崖山。拙者「永清史氏本末」及「張柔行實考」, 鈎考其事, 現收「元代漢文化之活動」中。

(註六) 拙著「元代太一教考」, 及「元代道教特質」均有說明。前者收東海大學出版之「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 後者收將出版之「元代道教之發展」中。

二、河朔雲擾中之農兵董氏

女真的崩潰, 是由外在的蒙古鐵騎風雨雷霆式的一擊; 長城一破, 即下中都。衛紹王被胡沙虎所弑, 擁立了昇王珣本名善觀改元貞祐, 是謂宣宗。他避兵南遷汴梁, 把河北地區委棄不守, 於是各地人民, 紛起自衛。蒙古兵來了, 有的開門迎降, 被蒙古人收編, 而成爲後來的漢軍部隊; 有的仍爲女真人守土, 受金廷的封授, 如金末九公輩; 有的依違南北之間, 以游擊姿態, 獵取功名, 如南宋山東忠義軍。這些形態, 我在舊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書中各篇, 以及史張兩考文中, 皆曾詳加分析, 茲不再贅。本文所述的橐城董氏, 即其中之一, 他的起事也和其他漢軍相同。不過董氏却更富於篤厚保守的農民性質。所以傳之子孫, 與儒學結緣, 有「漢萬石君石奮」的美稱(奮事見漢書)。

永清史氏之起, 是憑藉他家先世的社會組織——清澗社, 史秉直與史天倪皆負地方重望, 挾其宗族武力投靠蒙古大軍。史天倪又有雄略, 是有意問鼎中原的人物。張柔原起行伍, 爲金兵統帥, 敗後投降, 爲蒙古軍先驅綏靖, 這都不能算是起於阡陌。惟有董俊才真是以農夫起家, 初起時也沒什麼大志, 不過是保全身家, 苟活亂世而已。自他被蒙古人收容之後, 即死心塌地爲新朝效命, 決不依違於蒙金之間, 像劉成, 李全均見元史董傳諸人的反覆取巧; 和武仙的再降再叛, 終於走死道路。他最後還以身殉職, 做一個蒙古治下的忠義之士——戰沒於歸德。這樣才是蒙古人所衷心信賴的, 所以他的兒子們都做了宮廷的宿衛。在世祖忽必烈汗的帷榻之側, 幾乎有父子的情誼, 這與其他漢軍始終是外臣身份者不同。

董俊起於農畝, 但卻懂得敬重讀書人, 教子義方, 護庇了許多儒士, 不惟使他的家庭儒化, 也使眞定, 橐城成爲元初北方的漢文化之中心。談到元代的北方儒學, 董氏的維護之功, 實不可沒。但他們始終服膺道學, 不好辭章, 在至元之間, 支持着許衡一派義理之儒, 與金末制科之士徒單公履等對峙; 到後來又支持南方大儒吳澄一系, 實現延祐的儒治。這一家開始的表現是默默地, 遠不如史氏之在眞定, 張氏之在保陽那樣地招賢納士, 但卻源遠流長, 史張既衰之後, 他的第三四代依然翱翔仕途, 不時有所表現。我之所以選中此一家者, 就是這一點——與儒學的關係。藉此也可證我一貫的看法, 蒙古治下, 漢軍、儒士、道教皆有延續漢文化之功臣的觀點, 以非無根之談。

關於董氏的家世資料, 就我所見, 排列於下:

(一) 正史:

- 1 元史董俊傳卷八附其子文蔚、文用、文忠、文直。

董文炳傳^{卷二}附子士元、士選。^{五六}

2. 柯氏新元史董俊傳^{卷二}附文炳、士元、士選、文蔚、文用、士廉、文直、文忠、士珍、守中、守簡、士良、士恭。
3. 屠氏蒙兀兒史記董俊傳^{卷五}，子孫均附傳。^{十五}

(二) 元人文集中之碑傳及紀事；

1.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
 - 千戶董侯夫人碑銘^{卷五}。^{十二}
2. 姚燧牧庵集：
 - A. 董氏立本堂記
 - B. 董文忠神道碑
3. 虞集道園學古錄：
 - A.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卷二}。^十
 - B. 棗城董氏世譜序
4. 黃潛金華黃先生集
 - A. 御史中丞魯國公諡忠肅董公（守簡）神道碑^{卷十}。
 - B. 資德大夫董公（士恭）神道碑^{卷十}
5. 蘇天爵滋溪文彙：
 - A. 元故榮祿大夫中丞贈推誠佐德濟美功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魯國董忠肅公神道碑銘。
 - B. 元故朝列大夫（士良）開州尹董公神道碑銘。
6. 蘇天爵元文類收：
 - A. 元明善撰棗城令董君神道碑。
 - B. 元明善撰棗城董氏家傳。

(三) 關係文獻；

1. 袁桷清容居士集：真定安敬仲墓表
2. 蘇天爵滋溪文彙：節軒張先生神道碑銘，安先生墓誌銘。
3.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

左丞董忠獻公、內翰董忠穆公、樞密董正獻公各條^{卷十四}

其他散見元史紀傳及元人文章中者尚多，以非主要資料，只好隨文徵引了。

就以上資料來判斷，董氏家乘之最完備者莫詳於元明善的棗城董氏家傳，最早的大概要數姚燧牧庵集中的董文忠神道碑。據事略董文炳條注尚引有「野齋李公所爲墓志」，野齋不知是否東平李謙？容待查明。又屠著蒙兀兒史記董俊傳尚引有石刻追贈董俊聖旨碑。此文今亦不見他集，當與家傳同時，均爲較早資料。有關董氏家世文獻所以保存較完全者，實由於董氏二三代皆接近儒臣，同時又得同郡後起的名儒蘇天爵搜訪舊聞，具載入書；較之同時的其他風雲人物們就幸運得多了。

董俊名始見於元史太祖本紀：藝文影印武英殿版，以後同：

「十五年庚辰金宣宗興定四年，宋理宗嘉定十三年，西元一二一〇年穆華哩（木華黎）徇地至眞定……趨滄州，分兵徇河北諸郡，是歲授龍虎衛上將軍，右副都元帥。」

按元初漢軍將領，史氏首納降於木華黎之軍門，時在成吉思汗初入中原（太祖十年，西元一二一六年），張柔以金領兵先鋒，被執投降於紫金口，時爲太祖十三年（西元一二一九年），董俊之以藁城降附，據本傳說是太祖十年。那末還在張柔降附之前。此人是一個十足道地的農人，以應本州招募，勇悍善射，而領鄉兵，終以蒙古人攻城，爲保州里而率衆歸附。見於元史本傳，據說：

「董俊字用章，眞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箭靶子）募兵，……俊一發中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柯氏新元史（以後簡稱新史）所記相同。屠氏蒙兀兒史記（以後簡稱屠記）董傳也如此說。投降的時間都說是「十年、乙亥」，不過屠記補充說他「與縣令劉成，縣丞趙廸，同降於郡王客臺」，係據「石刻聖旨碑陰」，較兩史所紀更爲詳實。

藁城的地理沿革，據金史卷廿五地理志藝文版：

「河北西路、眞定府……縣九……藁城……」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

「眞定城中，太宗六年爲永安州……七年廢州爲藁城縣，屬眞定。」

此縣自漢即有，屬今河北省仍用故名，據中華版中外地名大辭典二六六頁說：

「縣城位於滹沱河之南岸，陸路南達趙縣，北通無極，西北至正定，東由滹沱河以達晉縣。」

自是水陸衝要之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新興臺新書局版論到眞定的形勝，引宋祁所說：

「河朔天下之根本，而眞定又河朔之根本。」

金末大儒王若虛也曾盛誇眞定的形註七。藁城爲眞定大縣，所以地理形勝甚爲重要。董氏起家於此，後來以偏師助史氏扼守眞定，撲滅武仙的抗蒙力量，並非偶然之事。

董俊初起，並沒有赫赫之功，只做了「知中山府事」今縣定却因爲金將武仙在太行山區之縱橫反覆，而表現了他對蒙廷的忠誠，遂被封賞。關於武仙事蹟，我在金將武仙本末一文中，曾有詳盡的分析註八。元史董傳說：

「己卯元太祖十三年，金興定三年，西元一二一九年以勞擢知中山府事佩金符，金將武仙據眞定，定武諸城皆應仙。俊率衆夜入眞定，逐仙走之，定武諸城，復去仙來附。戊辰春三〇，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俊軍時屯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獻捷於木華黎，由是仙以窮降，木華黎承制授俊龍虎上將軍，行元帥事駐藁城。」

此事見於元明善撰城董氏家傳，史傳全用其文。元史木華黎傳載武仙之降是庚辰年。

「庚辰復由燕徇趙至滿城，武仙舉眞定來降」

並未見有俊董之事。本傳又據家傳，紀董俊進言預測武仙「終不爲我用」。於是得陞左都元帥，駐節藁城，遂爲後來武仙叛殺史天倪，俊助史天澤恢復眞定之張本。新史董傳紀此事與元史董傳同，惟屠記董傳辨正其第一次入眞定之事僅稱：

「己卯、客台承制使知中山府事，時金將武仙據眞定，定武以南，悉爲金守，俊與仙

戰輒勝。」

其下注云：「石刻家傳所述止如此，而元明善撰城董氏家傳則云昇上……乃誤以丙戌年事闖入者。」

屠記此傳，較兩史皆得情實，並補記董俊與木華黎合軍的一次戰役。據說：

「庚辰春，金大發軍張仙威，治中李全以中山叛應之。時俊軍軍曲陽，仙來攻，俊敗之黃山下，仙脫走。乘勝克囊城寧晉沃州、平晉、沃州、平棘……承制授俊左副都元帥，行元帥府事佩金符原注：「舊傳誤作虎符。」仍兼知中山府事，撫定中山靈壽……得便宜辟置僚屬，刻鑄符印，以賞麾下有功者。秋木合黎謀真定，遣先鋒肖乃台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與合軍盧奴、……棄軍走歸真定，俊等追圍之，會國王大軍至，仙窮蹙逐出降。」

據注皆根據石刻家傳所加者，這就與元史木華黎傳庚辰之役情事相脗合了。由此可見武仙叛降不定，實造成董氏之功名。不過自此到太宗伐金之前，董俊在軍，並無所表現，而太宗伐金之役，他也僅是一員偏裨之將，並未預「三萬戶」之行列。本傳只寥寥數語載他戰死於歸德之役。據說：

「太宗四年，會諸軍圍汴，金主棄汴奔歸德追圍之，金兵夜出薄諸軍於水，俊力戰死之，時年四十八。」

董俊死於歸德金軍的夜襲，此事元史太宗本紀與金史哀宗本紀都不載，見於金史蒲察官奴傳卷一一六：

「……遂畫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四更接戰……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

這就是董俊死事之役，但也未見元兵將帥姓名。惟新史太宗紀始補記此事說：

「五年祭已……五月金將蒲察乘官奴乘夜來攻，撒吉思不花，及都元帥董俊等，皆戰歿。」

這當然是據家傳及金史官奴傳補進去的。不過董俊此時官止「元帥左監軍」見屠記董傳並不是都元帥，新史稍嫌誇張。

以上是董俊一生出處的大事，但在各史本傳及家傳中都提出他的農民樸實寬厚的氣質，與親近儒生的行事來，其特點有二：

一、親近儒素，孝弟傳家，如元史本傳：

「俊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廟祭疾病，跪拜必盡禮……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待族親故人，皆有恩意……」又說：「克汴時以侍其軸爲賢註九。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

此事新史，屠記皆載之，事皆出於元撰董氏家傳。

二、保惜民命，寬厚愛人；這是漢軍諸大將共同的作風，史董兩氏，尤其此特操。元史董傳：

「先是戊子歲蒙古拖雷監國一年，西元一二二八年朝於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不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困也。』

新史亦記此事，屠記補「其以實獻」四字。其他愛惜民命，不殺降俘之事，三史傳都同。這可見董氏在藁城的深得民心。事皆出於元撰家傳之文。所以董氏後代，忸忸謹謹，簡直是儒

士恭——守護
守利
守誠

文義早死

以上世系，元史董文炳傳分立，柯氏新史，雖合於董俊傳下，但僅擇其有名位者著於篇。惟屠氏蒙記晚得臺城董氏墓碑石刻，一一補列，最爲詳明，此表即據以臚列。董氏在當時曾有世譜，見虞集道園學古錄景泰本卷五臺城董氏世譜序，據云：

「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臺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德長久也，乃錄而序之。」此文未叙及董氏的事功本末。道園和董士選甚有交誼，集中却沒有詩文來往，甚爲可怪。也許是元明善已撰家傳，所以就略而不書吧。關於董氏第二代以董文炳功業爲最著，沒有他追隨忽必烈汗西征大理，諸弟等隨之聯翩晉見，怕董氏的事業早就完結了。董文炳既以戰功自顯，又以儒學教子弟，才開啓了董氏文治武功的一番事業。他的季弟文忠又久侍忽必烈宮廷，掌理符璽，宣傳王命，更加深了汗廷對董氏的印象，所以就「恩寵稠疊，世襲罔替」了。於此我擬分以下幾方面評述之：

(一) 起自藩衛的親臣

董氏之所以在世祖一朝大見寵信者，實由於是他的湯沐家臣。據虞集翰林承旨董公（文用）行狀道園集卷十

「弱冠以詞賦中真定，時以真定臺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邸，命公主文書帳中，常見許重。」

莊聖太后，即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妃怯烈氏，馮譯多桑史記其名爲莎兒合黑帖尼，謂其「有才智，能收攬軍心。」商務版二六二頁
第五章蒙哥時代元代諸王后妃皆有分地，即所謂「五戶絲」制度。元史太紀：

「八年丙申，秋七月，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州貴戚……」又食貨志三賜賣序言說：

「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

在同卷「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下記有：

「五戶絲，丙申年即太宗八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臺城屬真定路，所以說是「太后湯沐」了。董氏兄弟文用既早侍忽必烈於潛邸，文忠又親侍於宮廷，親狎的情形，如姚燧撰神道碑所說牧庵集十五——四部叢刊本：

「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也。……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

碑又記文忠自述之語說：

「吾固日鷄一鳴而跽，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蹴興之……」

像這樣地親近，真是蒙古統治者最忠實，最勤謹的幹僕了。所以董氏的功名，並不純是漢軍征伐的功勳，實在是皇家親臣的關係。

(註十) 新元史張瑄傳(卷一三九)「卒、五子，景武定遠大將軍……天歷元年，紫荊關敗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率鄉民挺斃數百人，參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執景武兄弟五人盡殺之……至順元年，帝……復籍五子家資。」

(二) 漢軍改制之重鎮——軍功

董氏第二代，再以軍功建樹，起於董文炳的從征大理，元史董文炳傳：

「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尙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由是日親貴用事。」

忽必烈之建立威望，是大理一役。在此之前，開藩金蓮川，用劉秉忠言，收攬儒生，親近漢人，定以漢法治漢之計(註十一)。董氏兄弟既居中用事，漢軍史，張兩氏也就樂爲之用。漢軍終於成爲擁護忽必烈躍登大位的主力，而董文炳也被選拔成立侍衛親軍，接替史張兩集團的任務，可謂皆自西征之役開始。

李璫之叛(註十二)，使忽必烈不敢相信山東的漢軍，只有重用親臣的董文炳來鎮撫東方。我前撰「元初李璫事變的分析」一文，曾說：「董文炳爲董氏的第二代，對平李璫事變的關係很大。」李璫既平，所有益都方面的善後，都交給他。其事載於元史本傳，事料出於元撰家傳，元名臣事略董忠獻公條也摘引之。茲鈔兩節，以見他在這一階段關係之重要：

「璫伏殊，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所部大悅，山東安。」

至元三年，上懲李璫，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預謀取宋方略……事略卷十四引家傳。

漢軍改制，是元初漢軍封建制度的結束，其事散見於元史史天澤、張柔諸傳。我於寫史氏本末及張柔行實考時皆有說明。董文炳侍衛親軍的建立，實在是漢軍的收場。武衛親軍之名始見於世祖紀「中統二年九月朔，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李伯祐董文炳言……」據元史兵志宿衛右衛條：

「中統三年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董文炳兼山東東路經略使。共領武衛軍事……至元元年改武衛爲侍衛親軍……」

忽必烈即位後，北方親王屢有叛亂，蒙古部族，多不能盡爲朝廷之用。漢軍遂在這兒，扮演很重要的腳色。董文炳次子士選與漢軍李庭在討乃顏一役中頗立力勳。元史董士選傳卷五：
一六

「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勞山李應之字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

新史傳文同，北征用漢軍也載於李庭、劉國傑兩傳(註十三)。這種契機怕是自董氏發之。董氏戰績在至元十二年伯顏南伐之役。極著勳勤。文炳既以前鋒將兵入於臨安，并撫定兩浙，其長子士元，復戰死揚州，一家子侄，皆從南征。元史伯顏傳卷二十七中有關董文炳者：

「(至元十二年)十月……壬戌至鎮江，罷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事。……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參政董文炳等爲左軍，以舟師自江陰趨漣浦華亭……乙酉十三年正月……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等巡視城堡入臨安諭軍民……」

元史、新史及屠記文炳傳，皆極言文炳南征之役的戰功。我以為伯顏入浙之役，先遣范文虎、呂文煥皆宋降將，文炳同行，實負監護之責，也因此而使他發揮儒學的風契，保全南宋史乘、文物，安撫江南士大夫，為南學北來鋪路。董氏効命南征的事蹟，元撰家傳也有鋪敘。而且從文炳跟隨忽必烈汗渡江鄂州之役起，鋪敘即詳，大概是史傳紀事的藍本。摘抄於次：

1. 鄂州之役：「已未秋宋理宗開慶元年西元一二五九年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上命公取之……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湫（按即後來夏貴拒伯顏扼守兵敗之處），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與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幢衝鼓疾趨，士選叫呼畢奮……宋大敗，文用驅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文炳戰功見於世祖本紀：

「壬辰至黃陂，遣廉希憲招臺山寨，比至千戶董文炳已破之。」

又說：

「湖之東曰陽羅堡……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

所遣當即董氏兄弟。他們那時官止千戶，僅屬裨將，但在宿衛，所以一戰而嶄露頭角。忽必烈北歸即位遂付以待衛親軍之任了。家傳說：

「二年（中統）……會立待衛親軍，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即追授待衛親軍都指揮使。」

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又載賞董文炳渡江之功，皆可證明。

2. 南征之役：此役董文炳為主，表現最多，董文用亦隨行，其侄士表，子士元皆從之行，而士元竟死於揚州之戰。家傳說：

「王師大舉入宋，……及宋人戰於羊羅湫，公以……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行樞密院駐劄鎮江……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與，揚兵致死於我……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公身犯前左，戰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宋師大敗……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此下復記招降張瑄事。」

董文炳長子士元的死事，見本傳附士元傳說：

「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帥博羅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士元……以部兵赴敵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

董士選是文炳的次子，最為知名，本傳紀其南征之功說：

「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陣觀之，壯其驍勇。……」

關於董氏二三代的戰功，大概就是這些，他們的表現仍在親近儒學與修勤吏治方面。

（註十一）見拙作「元初神祕人物劉秉忠」，收蒙古漢軍與漢文化書中東海大學出版。

（註十二）拙著「元初李壇事變分析」，收蒙古漢軍與文化中。

（註十三）元史劉國傑傳：「宋亡入朝，會北邊有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又李庭傳：「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反，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馮譯多桑史記海都之

役亦紀漢軍從征之事（原書三六三頁）。

三、董氏與儒學

由前面的敘述，襄城董氏自第二代一度以武功自奮通顯之後，即以儒學自名。此點當先看最早的資料，姚牧庵的董氏立本堂記卷六……

「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挺今中書左丞公士選時以翊衛親軍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

姚燧是貞元大德間北方的文人領袖，深沐許魯齋道學之教，言不輕發。此文如此推重，可見同時人已經以儒素家風推許董氏了。考董氏愛重儒學，起於董俊，前節已略述。元撰家傳曾說：

「汴陷時以侍其軸先生為賢，禮請歸教諸子。」下同史傳語。

侍其軸其人，屠記董傳注說：

「沈濤常山金石志董忠烈公家傳跋云『軸字乘之，見蘇天爵志學齋記。』」

侍其軸後與董氏經結姘好，董文炳長子士元之妻，即侍其氏新史訛為凌氏。見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五故武衛將軍侍衛親軍千戶侍其氏夫人碑銘云：

「夫人侍其氏，獲澤士家，父松岡先生諱軸。……先生素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忠獻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

一個農夫家庭，和儒學世家結親，當然能够濡染儒風，教養子弟讀書學道教了。

關於董氏親儒保護漢文化事，第二代以文炳、文用、文忠為最著，第三代以士選為「儒素親賢」。以下分別說明：

（一）董文炳之保存漢文化與儒素家風

董文炳雖然是以武功傳家，但却對漢文化有深切的愛好，兵下臨安，獨能保全宋朝史志。元史本傳說他：

「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在史館，其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

新史、屠記本傳皆同，此事亦出於家傳。惟記注「五十餘冊作『五千』，似以家傳為是。宋史保全由于董氏，與金史之保全由張柔，如出一轍。不過張柔武將，所以出此者，由元遺山之提撕，董氏則出於自發，更為難得。由此可知漢軍人物對漢文化之保存傳衍，實有不可磨滅之功。

文炳之近學問，出於少年，本傳說他：

「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家傳記他持家嚴肅的情形說：

「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及喪公，毀瘠逾禮……世之言家法者，比諸萬石君奮家云。」

又說他延禮儒士：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翰林直學士溥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

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歿則卹其孤……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

撰家傳的元明善是文炳之子董士選的賓僚。撰文不免夸飾，但證以姚牧庵立本堂記，文炳親近儒學，當係事實。

(二) 董文忠之斡旋儒治

董氏的功名，由於宮廷的親幸，文忠侍內三十餘年，實為重要關鍵。文忠做人的風格却是道學的一脈，此點詳記於姚牧庵的董文忠神道碑。據說：

「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

當時在忽必烈左右的儒生，原有詞章義理兩派。曾獲金代科名的如王鶚、王磐，以及徒單公履，都是詞科出身，與元好問同一趨向，重視詩文。而姚樞、張文謙、許衡等，則接受南宋朱學，列江漢先生趙漫之門（註一五）主張道學，重躬行，薄文詞。因此有至元間一場道學科舉之爭辨。碑稱：

「八年，侍讀徒單公履，卻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姚樞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言『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己能，欲固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儀斯文。」

此事元史，新史及屠記文忠本傳皆載入。蘇修元名臣事略，樞密董正獻公條亦據碑載入。元代中統至元間，漢法畢行，獨獨未行科舉，只行國學教士之法，實許衡道學一派，重經學抑科舉的關係。董文忠以近臣為之斡旋，也是重大的助力。

(三) 董文用的儒雅好士

董氏第二代中，文炳、文忠之外，以文用最為儒雅，而且道學氣很重。大概是在忽必烈藩邸時，奉命招集儒士，與姚，許諸道學之士親炙，遂也沾些理學氣味吧。他的生平親儒之外，以政事擅長，具載於道園的翰林承旨董公行狀，元文類收在卷四十九，蘇撰元名臣事畧，內翰董忠穆公條採集甚多。據行狀述他的儒學：

1. 早年接近諸老儒：「丁巳、令授皇子經，……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右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峰魏公瑋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這些亡金諸老儒，學行皆高，董文用與其親炙，不怪其立身具有本末了。

2. 持家孝友，為學誠實，行狀說：「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麗……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餽粥之資。」

這豈不是古代儒臣的風範嗎？

3. 推賢荐士：行狀又說：「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人有善必推舉……故天下士爭歸之。」

文用有荐士的美德，故其侄士選乃能汲進文士，為延祐——至順儒治的中堅。在元史士選傳中還載他的明於掌故，此為行狀所未及。據說：「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

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詢問，文用應之無遺失。」這也是世臣碩德的規模。

(四) 董士選的親儒好士與汲進南學

董氏第三代，以文炳之子士選聲名最著。他與文儒虞集，元明善最有交誼。在南方從宦甚久，所以肯汲進南儒，對南學北來，大有關係。可是他的傳記，未見於元人文集與元文類，元名臣事略亦未載其行事。大約因此兩書之成，尚在士選生前，元明善清河集又經散散棄城家傳，係應士選之請，士選生存僅載其官閥。所以關於他的事蹟，仍當求之史傳。元史本傳所紀，新史，屠記都無出入。元史本傳記其親近士流，荐引名士的情形說：

「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道園之父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爲首。」

吳澄爲元代後期儒學之中心，由程鉅夫薦引登朝，但不久南歸，後來再起登朝，把南方儒學，大傳揚於北方，也許由於北方親貴之董氏汲引之力。董士選之識吳澄，由於元明善爲先容。元史吳澄傳卷二：

「元貞初游龍興……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

可見董之識吳，實由於元明善先執弟子禮於吳氏，才引起董的尊敬，而接近了理學門庭。又虞集傳卷二：

「……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

虞氏也爲董之家庭塾師，難怪後來在朝互通聲氣，與元明善同列董門了。但與他因緣最深的還數元明善，元氏是元代中葉的北方大文學家，朝廷侍從甚久，集名「清河集」久已散佚，清繆荃孫曾有輯本，收於藕香零拾叢書中。我在元初儒學一書及「元人文集中之道教文獻」一文中，畧介生平，茲不再贅。只抄摘傳文有關與董士選之交往：

「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辟掾行樞密院董士選僉院事，待若賓友，不敢以曹屬遇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

本傳又記士選調停他與虞集的交通說：

「……二人初相得甚謹，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之都門外……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囊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挫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

此事我於前寫道園集題記註十六也曾記入，於此可見士選的拳拳愛士之誠了。

士選傳中又說到詩人范梈，元史此人傳附虞集僅記說：

「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

此事見於揭曼碩集「清江范先生詩序」並無他語，大概也以江西士子的關係而相識。

(註十四) 元好問遺山妻王氏與張柔妻家有連。元兵入汴，柔護金史，後來元氏保住屬陽，抄金實錄，此事拙撰元初儒學及張柔行實考皆述之。

(註十五) 見姚撰書江漢先生事及姚樞神道碑，文皆收元文類，拙撰元初儒學皆述及。

(註十六) 載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現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書中。

四、董氏的吏治與立朝大節

在蒙古治下的漢軍人物，其作風有一共同的趨向，那就是「保全漢文化與愛護人民」。史氏如此，張氏如此，董氏更是如此。董氏的儒學家風，在前節說過，現在再看他們幾代人物在地方吏治與立朝大節所表現者如何。關於此，元史，新史，屠記各本傳，皆有記載，其取材為董氏的碑誌家傳。茲分兩方面述之。

(一) 董氏歷代的愛民勤政

自董俊以農兵首領，率橐城降附後，即世代兼領橐城縣令。元史記董俊治理橐城重視農耕：

「為政寬明，見人善治田廬，必召與歡語，有情者必怒罰之。」

屠記董傳也載入，語出於元撰家傳。當大兵之後，農田墾治，實吏治當務之急，當時漢軍治下的地方長吏，莫不如此。第二代董文炳少年時時為城令，治更彰績。元史本傳說他：

「歲乙未以父任為橐城令……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里人亦大化服。」

又記文炳的愛民之政：

「縣民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與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

「貸家」就是蒙古初期的羊羔兒息，也即元史食貨志所謂「幹脫錢」，當時漢軍史氏曾建議減息，我曾寫文考證（註十七）此不再贅。文炳此舉與史氏在真定的惠政用意相同。本傳又記他：

「文炳使民計口而居，少為戶數……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

那更是在蒙古人的剝削下保全民力之善政了。這些事也見於元撰家傳。董氏兄弟有名文直者，也做過橐城縣令，元明善撰「橐城令為府君神碑」元文六十類卷五記他的惠政說：

「忠獻文炳令鄉縣，縣大治，號董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實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放貸；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饗舍，招名儒……凡十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

諛墓之文，容有不實，但董氏世代之重視吏治，大概是事實。

董氏第二代治橐城之外，即數董文用在衛輝路之治績。計有①罷免境民接運江南圖籍金玉財帛的任務，改用州縣吏卒。②立驛置法以運糧，民力以舒。③駁議開沁水之役等，事皆出於虞撰行狀。但董文用之表現者，仍在立朝之大節，吏治不過其餘事而已。自第二代以下，董氏第三、四代，有士良、守簡兩人，皆以吏治名。新史，屠記，據家乘補為列傳。他們的傳記資料，見於(1)蘇天爵滋溪文稿幾輔叢書本有二篇：元故朝列大夫開州尹董公士良神道碑銘與元故榮祿大夫御中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國董忠肅公墓誌銘。(2)黃潛黃文獻集商務四部叢刊

本二篇：御史中丞魯國公忠肅董公守簡神道碑與資德大夫董公神道碑。滋溪所記董士良、董守簡事，我曾寫入元儒蘇天爵學行評述文中（註十八）其董守簡治績係在淮安路總管任內為疏運糧道，減省民力，要不失為好官。屠記董氏傳，記董文忠最有名之三子士珍士良士恭及其孫守中守簡之事，關於吏治部分：

1. 董守中：「改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河北饑，部使者下令逐流民南渡，守中止而振之，全活無數。……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興國路龍閣；諸山亦產銀，有請包辦蒙山銀者，守中曰『此姦利之民』斥弗聽。……遷湖北道廉訪使，歲饑，豪民控米商遏糴，城中斗米至萬錢，守中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撥貢士莊錢入學養士……士論翕然頌之。」

2. 守簡部分：「除淮安路總管，歲旱，條荒政便宜奏之……先以祿廩倡官民輸錢粟……刊溝澗，發官帑浚之，使饑民得食其力。……未幾遷汴梁路總官……叙清江治獄事汴人以為神明。」

此外董士良，董士恭居官行事皆有記載，並非大節，此不再贅。以董氏歷官都能重視吏治，保民省事，實不愧為儒學的家風。

（二）董氏二代以後的大臣風度

董氏功名，實盛於第二代。董文炳不獨平南的戰功烜赫，受到汗庭的寵異，還在忽必烈此征時期，受命留守。董文忠更是始終侍居禁闈，董文用也歇歷內外，參預行省。可是他們的立朝風度端凝，都不與姦邪妥協，對蒙古親貴也不與阿附。到第三代董士選仍保有這種氣節，即使是末代人物，在朝也有他的風度。現在分別擴引傳記來說明之。

(1)董文炳不附阿合馬：元撰家傳說「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比至，上曰『……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以行。』……公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為少斂。」

此事元史本傳亦載之，忽必烈時代，任用西域人為相，前後有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等，其貪黷負利，民不聊生。中國儒臣，多和他們掙扎，略為漢人爭得一點喘息的機會。董文炳如此，董文忠也與桑哥為敵。

(2)董文忠不附利臣：姚撰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載有：

「……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門下省……其臣弗便也，入言『……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辨曰『……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此事見之元史文忠本傳亦記其事，都沒有說出其人姓名，惟屠記文忠傳，說此人為桑哥說：

「廷議以文忠為侍中……汗亦欲廉希憲情省長，桑哥恐省立不遂其私，而尤忌文忠……」

此文下注稱：

「桑哥為宣政使，與阿合馬表裏為奸，舊傳不著其名，但稱近臣，姚燧撰墓志，亦止稱某臣，時桑哥尚未得罪，故臨文諱之。」

此注得其情實，但元史修成於明初，為什麼不改傳文呢？大概成書倉卒，史臣失其照應吧。

(3)董文用的守正不阿：董文用生平詳見於虞集所撰行狀，所記有議行御史與面折盧世榮及在江南與西僧抗爭三事。據說：

「九年……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尙書……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台隸行省……狀上集議。公曰『不可；御史台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後悉從公議。」

這是保存南台御史及按察司之事。當至元初平江南，北方親貴，肆虐地方，賴有這兩個機關，爲儒臣所領，略能抗拒豪強，爲民請命。所以後來程鉅夫建議參用南人，江南訪賢，多安置到這些地方（註十九）董文用此議可謂知本。行狀又說：

「遷翰林集賢學士，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諸民？……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

元史文用傳，朱載此事，而記其抗違權臣桑哥之事說：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是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文用……獨不附之……乃捫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屈，於是具奏桑哥姦狀。」

像這樣的獨立不撓，更勝於文炳，文忠以消極不合作的對抗阿合馬了。

董士選的方正敢諫：董士選的薦引賢才，已見前述，他的在朝大節，據元史傳說他：

「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不嚴而肅，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風采明俊，中外竦然。」

又記他苦諫成宗鐵木耳汗遠征八百媳婦國（註二十）的大役，說：

「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

以上所擴叙的，皆是他們董氏二三代在朝的大節。至於其他人如董士珍，董守簡等，史傳都有所紀之處。但那不過是太平時代居官者本分內的事情，也毋勞瑣記了。但董家也有不成材的，即董士珍幼子守庸在英宗時代御史中丞任內，黨附逆臣鐵失（註二十一）被許有壬彈劾而免官，不免有辱家聲了。

（註十七）見拙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蒙古治下西域人的軛脫錢。」

（註十八）文載東海圖書館學報，現收「元代漢文化活動」書中。

（註十九）參閱拙著「江南訪賢與元祐儒治」一文，載東海學報，亦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書中。

（註二十）八百媳婦國，西南夷一種，在今泰國境內。

（註二十一）見元史許有壬傳。

五、餘 論

在河朔漢軍三世家中，董氏最爲文雅，因之對眞定地區文化之發達，頗具影響。河朔地區，從史氏建立眞定帥府，張氏建立保陽帥府以來，北方文儒，群往趨附，當地亦復大儒輩出。但似乎皆以眞定爲中心，正如山東方面以東平爲中心一樣。劉因生於保定而傳其學者的烏冲安熙兩大儒，都在眞定方面，又皆與董氏有甚深之關係。至元代論眞定文化者莫如蘇天爵，他撰的志學齋記，論述眞定文儒之盛，有以下一段：

「昔者國初丞相史忠武王天澤之治眞定，教行俗美，時和歲登，四方遺老，咸往焉依。若溥南王公若虛遺山元公好問，敬齋李公治頤齋張公德輝西庵楊公條山泉張公雄飛，問學文章之富，言論風采之肅，豈惟時政有所裨益，而搢紳儒者，皆仰賴其聲光模範，以

成其德焉。

當是時，爲郡學官者，則有侍其先生乘之，吳先生蓋臣，硯先生伯固，張先生世昌，授徒其家者則有安氏祖孫，馬氏父子。仕於中朝，若翰林學士李公，參知政事王公，宣慰使周公，御史中丞于公，皆其人也。是則百年以來，公侯大夫之所表帥，父兄師友之所教養，衣冠人物相繼而作者，其盛矣乎！」

從上面一大段文章看來，元代真定文物之盛，可以想見。真定籍中傳世的元人文集，著名的如王若虛滹南遺老集，蘇天爵氏滋溪文稿之外，還有王沂的伊濱集，侯克中的巽齋集。同時真定人物也散處各方，如侯克中即寄居杭州，與當地士大夫唱和，均足以支持蘇氏的論證。其中所舉的侍其乘與安氏祖孫，張世昌諸人，皆董氏的賓友。硯伯固名彌堅是劉靜修的道學之師，蘇撰劉氏墓表說：

「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遊。」

可見劉氏之學，屬於真定文化。安氏祖孫，祖名滔，父名松，子即安熙，滋溪文豪有安先生墓志銘說：

「教授於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

烏冲是劉靜修的弟子與安熙的授受，亦見蘇撰「故處士贈秘書郎烏君墓碑銘」，據說：

「真定安君熙通經學古，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烏）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發焉。」

董氏與烏家連姻，董守簡之妻即烏冲之女，見黃潛所撰「御史中丞……忠肅董公神道碑」
黃文獻集
卷之十下

「公娶烏氏，國朝名士冲之女，於經史無不通。」

再合看前述董文炳之子士元妻侍其氏，即侍其軸之女一事來看，董氏與儒學的漸漬可謂深厚了。當中張世昌，又見蘇氏所撰「故真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據云張之行狀即「國史院編修官董士廉所述」。士廉即董文用之子，名見屠記董傳。據蘇氏此文：

「先是邑中大族若董氏、趙氏、王氏……各遣子弟就學，先生師道尊嚴，諸生賴其訓誨，進多貴顯……」

從以上這些文獻來看，由於漢軍將領的保全文化，而文儒趨附；又由於文儒之來，使漢軍子弟們，一變至道。從真定地區文化之當展過程，可以得到漢軍與儒學的相互關係。而董氏家庭，尤其是儒雅過人，不止親炙元代北方儒學，而且引進南方儒學，促成元代後期——延祐，至順間的儒治。不怪元代文人爲他家作碑銘的都津津樂道了。（完）

五七、四、二，脫稿於東海校園

本文參考要籍

- 一、元史帝紀，志、列傳（臺北藝文書局景印本）。
- 二、新元史帝紀，志、列傳。（同前）
- 三、屠寄蒙兀兒史記董俊傳（臺北世界書局景印本）。
- 四、蘇天爵國（元）朝名臣事略（商務叢書集成）。
- 五、蘇天爵國（元）朝文類（商務四部叢刊本）。
- 七、金元人文集（多采四部叢刊本）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 王若虛滄南遺老集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 姚燾牧庵集, 虞集道園學古錄
黃潛黃文獻集(叢書集成本)

蘇天爵滋溪文稿(畿輔叢書本)。

八、宋元學案：魯齋學案草廬學案。

九、馮承鈞譯法人多桑蒙古史上册(商務版)。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Tung Family in the Han Troops of the Yuan Dynasty

Sun, Ke-kuan

The present article constitutes the third part of "The Three Families in the Han Troop during the Yuan." When the Mongols first came to China, the militiamen and the defeated soldiers of the Ching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Mongolian army as a special detachment called the Han troops. Three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se troops were found to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Shih*, *Chang*, and *Tung*. They contributed very much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an culture to the court of the Mongols. Tung Chun and his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were explor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元代漢軍藁城董氏本末

孫 克 寬

本文為作者「元代漢軍三世家考」的第三部分。蒙古人進入北中國，原在該地的民衆武力與亡金的部隊，降附後，被編作為先遣或鎮戍部隊，成為一個特別兵種——漢軍。在黃河北岸，太行山區，以保定（清苑縣），真定（正定縣）為中心，有史氏、張氏與董氏三個漢軍領導人物。他們保護漢人的生命財產，掩護漢文化的流傳，把儒生與儒學介紹給蒙古宮廷。董俊以藁城地方的農兵首領降蒙古，他的第二三代，以宮廷侍衛與儒臣的姿態出現，至元末，還有表現。本文旨在闡明他們對漢文化流傳的重要關係。